



# 明史研究论丛

Essays in Ming History

第十七辑  
Issue Seventeen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七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明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 - 7 - 5203 - 6153 - 8

I. ①明…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248.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4647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石建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湛若水在西樵山（1517—1521）

——随处体认天理

[美] 伊来瑞 (George L. Israel) 著 肖 啸 译

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明代杰出的士大夫湛若水极为恭敬地呈上一份奏疏，即《为陈情乞恩养病事疏》。<sup>①</sup> 时年五十岁的湛若水在上疏中历数过往之艰辛，少年丧父，其母寡居无依。因此，在他二十七岁考中举人后毅然返乡，照料母亲长达十三年，然而湛母却一直盼望其能考取功名，学以致用。最后，湛若水被母亲的诚心所感动，亲赴北京参加会试，一举中榜，“荷先皇之明，选以庶吉士（翰林院）”<sup>②</sup>。他感念君主之恩，积极履行职责，不久就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

以上诸事均发生于正德二年（1507）之前，也即湛若水年满四十一岁那年。湛也向皇帝描述了他近年来所遭遇的困境。母亲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他因而将其从广东接至北京，悉心照料，祈盼母亲顺心遂意，并无暇兼顾其他。但是，“天罚臣愆，母卒京邸”<sup>③</sup>。他伤心欲绝，“上之不能有所建白，以裨神明；下之不能早自引退，以宁慈母。实为忠孝罪人，夫复何言！”<sup>④</sup> 极度悲痛之下，湛若水扶灵回粤，安葬母亲，开始守孝，并于正德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服阕。<sup>⑤</sup>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三六《乞养病疏》，台北“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2005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三六《乞养病疏》，第8页。



在奏疏的最后，湛若水承认自己应该按照惯例回吏部报到，但同时也谈及自身健康状况。饱受丧母之痛的折磨，他身体越来越差，形容枯槁，萎靡不振。这使他愈加忧心忡忡，“郁积日久，血气既亏，精神顿损。如破屋漏船，风水易入，七情所感，百病交攻，眼花头眩，痰涌自汗，诸症以时并见”<sup>①</sup>。于是，湛若水恳请正德皇帝，希望可以“谢绝人事，采药西樵，养其身疾以有为”<sup>②</sup>，待其身心复原后再为朝廷效力。

皇帝应允了他的请求。这显然在湛若水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早一个多月前就已举家迁至西樵山，时约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十日。至少，湛若水在给杨骥（？—1520）的信中也是如此陈述的。<sup>③</sup>其时，杨氏正求学于在南赣地区平息武装叛乱的王阳明（1472—1529），一位颇具声望的儒学大师和政治家。湛若水也是杨骥的老师，因而他在信中就多哲学问题阐明其立场，并敦促杨氏“更反复思之，以质阳明，言不能尽也”<sup>④</sup>。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写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毕业于王，学于王者，或毕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sup>⑤</sup>诚然，王阳明和湛若水毫无争议皆为明中期具有影响力的儒学大师，两人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二人均于成化年出生，弘治年考中进士，且都历官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二人交情深厚，皆被尊为儒学宗师，吸引了大批求学士子，直接影响了明中期的讲学活动以及随之兴起的书院运动。<sup>⑥</sup>此外，二人也积极著书、创立学派，均建立了各自精密的儒学体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湛若水思想学派的命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三六《乞养病疏》，第8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与杨士德》，第9页。

④ 同上。

⑤ 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下册，第835页。

⑥ 参见 Meskill, John Thomas,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A Historical Essa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运呈现出一种与阳明学派完全不同的局面。<sup>①</sup> 众所周知，王学不仅在 16 世纪的明代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对日本德川、明治时期的思想史也影响深远。<sup>②</sup> 20 世纪上半叶见证了王学在中国的复兴，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又掀起了一股王学热潮。<sup>③</sup> 此后，有关王阳明及其重要弟子的英文、中文和日文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数不胜数。

湛若水的研究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一方面，湛若水是陈献章（号白沙，1428—1500）最著名的学生，门人弟子数千，至少创建了 33 个书院。<sup>④</sup> 他的传记和著作选编也被收入一些清代文集当中。<sup>⑤</sup> 另一方面，他的学派在其过世后迅速衰弱。一代弟子谨守师说，以江门学派传人自居，视陈献章为学派开创者、湛若水为承续者。但是从二代弟子开始直到明代末年，学者们在受到湛氏学说影响的同时，也会融入其他儒学大师或者学派的思想。<sup>⑥</sup> 纵观整个清代，由于心学沉寂，基本没有学者或者学派提倡湛若水的思想。到了 20 世纪，除了偶尔几篇零散的成果以外，学界关于湛若水的研究依旧十分匮乏，甚至可以说处于失语的状态。这一现象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有所转变，日本的志贺一郎、美国的金安平以及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sup>⑦</sup> 此后，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增多，但是英语世界却依然不足。

① 对其学派流变的分析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参见王文娟《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 2012 年版，第 7—8 页；戢斗勇《甘泉学派》，广州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3—116 页；Woo, Ann-ping Chin, “Chan Kan-ch’uan and the Continuing Neo-Confucian Discourse on Mind and Principle”, Columbia University Ph. D. 1984, pp. 167—172。

② 参见 Ogyū Shigehir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Yōmeigaku in Meiji Japa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trans. Barry Steben, *East Asian History*, 2000 (20): 83—120。

③ 关于英语世界的研究史，参见 Isra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ng Yangming Scholarship”, pp. 135—156。关于中文学界的研究情况，参见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604 页。

④ 黄明同：《岭南心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9—181 页。

⑤ 黄宗羲用六卷的篇幅论述了湛若水及其学派弟子。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下册，第 875—1040 页。

⑥ 戢斗勇：《甘泉学派》，第 6—7 页。

⑦ 有关湛若水研究现状，中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参见黎业明《湛若水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9 年；金安平撰写了最长的英语研究论文，以及翻译了一些湛若水的文作，参见 Woo, Ann-ping Chin, “Chan Kan-ch’uan and the Continuing Neo-Confucian Discourse on Mind and Principle”；志贺一郎出版了湛若水研究论著，最完整的介绍性著作是《湛甘泉の學說》，参见 [日] 志贺一郎《湛甘泉の學說》，东京风间书房 1983 年版。



显然，有人会问，湛氏学说的影响力不及阳明是否根源于其哲学成就的相对固有价值。实际上，尽管没有明确论断，但是中文学界已经展开了相关讨论。<sup>①</sup>部分学者提出，导致二人学术影响力差别的原因在于王阳明异于常人的事功成就和明中期的政治生态环境；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阳明学说更加深奥和引人注目。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引用两位权威学者的论断应该足够。唐君毅曾指出，“与阳明并世，同堪称大儒，而与阳明尝相推许者，有湛甘泉”<sup>②</sup>，钟彩钧也发现“我们可以将他对学问的研求讨论视作反映时代思潮的一面镜子”<sup>③</sup>。

正德十二年（1517），湛若水举家迁至西樵山后，创建书院，授徒讲学。他在此地隐居四年，直到十六年正德皇帝过世后，接到指派重回翰林院任职。这四年治学生涯意义重大，他不仅兴建了第一个书院，制定训规、亲自掌管，还在此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成为其日后奠定儒学大师地位以及建立思想学派的基础。<sup>④</sup>然而，虽然西樵治学对湛若水学术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学界对这一时期湛氏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教学方法以及心学思想的诸多面向却缺乏具体细微的论述。因此，考虑到王阳明在学界万众瞩目的关注程度，本文则尝试以湛若水治学求道的重要阶段为研究视角，介绍阳明以外另一位明中期著名的儒学思想家。

湛若水在服丧隐居的十年前才踏入明代士大夫精英阶层，较常人稍晚。<sup>⑤</sup>他出生于广东增城县沙贝村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位于广州的东北方，距离京城十分遥远。“若水”是他后来改的名字，更多人称其为“甘泉”，源于其家所属之甘泉都。<sup>⑥</sup>

① 参见黎业明《湛若水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第148页。

②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③ 钟彩钧：《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九期，2001年，第346页。

④ 参见任建敏《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游腾达《湛甘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2年，第59页；王文娟《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第9页。

⑤ 关于1472—1529年进士的年龄层次划分，参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p. 706。在1529年的进士群体中，20.7%为26—30岁，31.2%为31—35岁，20.7%为36—40岁。1504年中榜的湛若水，应被归于第三类。

⑥ 关于湛若水的简明传记，参见Chaoying Fang, “Chan Jo-shui”,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Vol. 1,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6—41.



湛若水十岁的时候，家逢不虞之变，其父过世。因此他正式的学校教育开始得比较晚，十四岁始入小学，十六岁入乡校，二十二岁入府学。<sup>①</sup>湛若水年二十七通过乡试，考中举人，却于弘治六年（1493）北京会试中落第。次年，湛若水前往江门——一座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下游的城市——求学陈献章。其时，陈氏是广东最负盛名的儒学大师。黄宗羲认为他改变了明代哲学的进程，“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sup>②</sup>。陈献章毫不掩饰地告诉湛若水，在求“道”的过程中，“此学非全放下，终难凑泊”<sup>③</sup>。因此湛若水“遂焚原给会试部檄”，绝意科举长达十年。他全心全意照顾母亲，并且致力于个人学术进展。<sup>④</sup>

湛若水从学于陈献章长达五年，直到弘治十三年（1500），陈氏去世。此间，他长期往返于增城和江门之间，修习白沙的自得之法“静坐中养出端倪”，弘治十年终有所悟。湛若水后来与学生谈及此事时道：“今日‘天理’二字，实是元初予自悟得，可念二三十年未得了手。初从白沙先生，归甘泉半年，有悟处，致书请问先生”<sup>⑤</sup>。

湛若水在给陈献章的信中曾提及，初入门时，承蒙老师亲自教授孟子“勿忘勿助”之旨，意在发扬“无在无不在之要”。归家以后，他反复思索，却仍不得其要。但是，突然有一天“一旦忽然若有开悟”，他因而感悟程颢（1032—1085）“‘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和李延平（1093—1163）“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意。<sup>⑥</sup>湛于是写道：“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概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倚衡，无非此体，在人涵养以有之于己耳云云。”<sup>⑦</sup>

陈献章惊叹于湛若水对天理的洞悉，将其认定为自己最出色的弟子。他当即在回信中表示了赞同，认为湛氏的阐述“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

① 参见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10页。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上册，第79页。

③ 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页。

④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第12页。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六九《新泉问辩录》，第21页。

⑥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上白沙先生启略（拾遗）》，第1页。

⑦ 同上。



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嘉处？”<sup>①</sup>弘治十二年（1499），陈献章又指定湛若水为衣钵传人，以江门钓台相赠。这意味着湛若水不仅应承担传授白沙心学的责任，同时也有权统摄江门学旨。此后，“随处体认天理”便成为湛氏最重要的治学法门。

陈献章葬于江门圭峰山麓之后，湛若水为其服丧三年，如丧亲父。<sup>②</sup>弘治十七年（1504），湛氏在母亲的敦促下进入南京太学，重新准备会试。这一次，他顺利中榜，从此跻身于精英主导的士大夫阶层。<sup>③</sup>随后，湛若水供职于翰林院，直到正德十年（1515）丁忧回乡。此间，他从庶吉士升至编修，也偶尔接受朝廷指派，担任外出使臣。例如正德七年册封安南国王，就使得他离京长达两年，不过大部分旅程都有母亲相伴。出使安南途中，湛若水顺便送母还乡，返京途中又再次奉母北上。次年正月，他刚回翰林院复职不久，母亲旧疾发作，于三日后离世。这就是他向正德皇帝所陈述的整个艰苦过程。湛若水将母亲安葬于广东荷塘，并在此守孝三年，正德十二年四月三十服阕。

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湛若水入住西樵之前，特意前往白沙墓地拜祭，并撰写祭文，曰：“於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食我者君。盖三本之不可以一遗，况先生于俗学之支离，念人心之惟危，而扶我于颠跻，开我之沉迷，其功同夫生死而肉骨，夫岂但哺糟而啜醢也。”<sup>④</sup>

随后，湛若水偕家眷隐居西樵山大科峰烟霞洞。十月，开始修建居所和书院，工程分为两个阶段。正德十二年（1517），居所先完工，主要建筑有栖霞楼、茹芝堂、正谊堂、崇经楼和乐阁。虽然独立的大科书院已经在修建了，但是湛若水在其完工之前也时常将居所称为书院。正德十四

① 陈献章：《与湛民泽（十一）》，《陈献章集》，第193页。

②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第19页。关于陈献章下葬情况，参见陈献章《陈献章集》，第862页。

③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第21—22页。

④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五七《祭白沙先生墓文》，第5页。



年，在居所的石门下，大书院建成，有凝道堂、进修斋、敬义斋和寅宾馆。<sup>①</sup>

湛若水隐居西樵山，修身治学，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收到吏部檄文，令其复职翰林院。时年，正德皇帝病逝，内阁首辅杨廷和整肃朝纲，选定正德之堂弟为皇位合法继承人。在这敏感的过渡期，湛若水的两位同僚，朱节（1514年进士）和吴廷举（1487年进士）上奏提请让其恢复官职。此次复职进一步证明了任建敏的观点，他认为湛若水入住西樵的主要原因除了健康问题以外，还与正德年君王昏聩、宦官专权的政治局势有关。<sup>②</sup> 吕柟（1508年进士）曾为大书院作记，写道：“大书院，甘泉湛先生西樵讲道之地也……正德间权珰踵横，忠良率遁匿山谷不出……丁丑之岁甘泉先生守史官，以母夫人忧去，免忧，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来，亦隐西樵山中。”<sup>③</sup> 此外，湛若水隐居西樵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躲避增城县的动乱。湛氏曾对杨士德说，他因贼匪来袭而被迫举家迁至广州城，将家人安置在广州城后，他便独身前往西樵山挑选合适的栖身之所。<sup>④</sup>

不管怎样，自正德十二年（1517）卜筑西樵之后，湛若水四年来潜心治学，不仅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还与众多士人学者互通书信，交游论学。湛氏个人也极为重视这段治学生涯，在给朱节回信中提及自己多年来与学生和友人论学的感悟，“颇觉与向时所见差别”<sup>⑤</sup>，他也同样告诉学生，“吾年五十而后学渐得力，盖从前未曾深加致知之功，虽力行涵养而未能真知，是以未能无惑也”<sup>⑥</sup>。事实上亦如此。此前二十年中，湛若水虽然撰写了数量可观的诗信、序文、赞辞、墓志铭、记文和论说，但是总的来说，却并未形成一种持续的哲学观照，或者说系统性的论述和教法。然

① 关于书院的修建问题，虽然根据文献不同，某些细节会有出入，但大体的时间轴是准确的。对此，任建敏已有充分论述。参见任建敏《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第66—80页。

② 任建敏：《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第73页。

③ 吕柟：《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大书院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2—524页。

④ 任建敏：《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第73页。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答朱守中侍御》，第1页。

⑥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答朱守中侍御》，第13页。有关此议题，参见游腾达《湛甘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60页。



而，他在西樵山的著述却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游腾达通过研究湛若水哲学思想之形成过程，认为这段时间“是他学思转趋深刻的重要阶段”<sup>①</sup>。

因此，首先论述这些著述的缘起和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正德十三年（1518），湛若水给陈惟浚写信，详述自己某晚在烟霞洞悟道的经历，同时也提及山居时著成的《大学测》和《中庸测》，认为这是“区区近年用心要处也”<sup>②</sup>。多年以后的嘉靖十六年（1537），湛氏曾向学生解释“测”字的含义，“‘测’也者，测也，不敢知之谓也”<sup>③</sup>。

不幸的是，此二书现如今仅存序文，然而却也足以看出湛若水的撰述缘由。《古大学测序》记道：“甘泉子读书西樵山，于十三经得大学古本焉。”<sup>④</sup>湛氏也多次教导学生，戴圣《礼记》所载《大学》篇为最本真的原始版本。<sup>⑤</sup>他跟王阳明和方献夫一样，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改本极不认同。<sup>⑥</sup>众所周知，朱熹所注四书在元明两代被朝廷钦定为科举用书，享有官学正统性地位。湛若水通过提倡《礼记》第四十二章中所载《大学》古本，“谨离章集训而测焉”<sup>⑦</sup>，向既定的教育和政治权威发起挑战。

湛若水在序文中对《大学》进行了毫无保留的颂扬，并通过问答的方式，展现了其所关注的核心哲学命题。湛氏认为《大学》的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即教导个人修身养性，并且推己及人而“亲民”。同时，《大学》文本也极为简易，扼要地阐述了“止至善”的修养之法。体和用，即理论基础和实践法门是完整的哲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两部分。序文中，问者“请问其要焉”，湛若水提出《大学》的核心问题在于至善，“至善也者，以言乎身心之于家国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纯粹精焉者也”<sup>⑧</sup>。这些都是天理，而

① 游腾达：《湛甘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60页。

②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寄陈惟浚》，第4页。

③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二四《修复四书古本测序》，第6页。

④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六《古大学测序》，第18页。

⑤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四《知新后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⑥ 参见刘勇《王阳明〈大学古本〉的当代竞争者：湛若水与方献夫之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0期，2015年1月，第159—181页。

⑦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六《古大学测序》，第19页。

⑧ 同上。



“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大学》从根本上指导个人达到心之自然中正处，从而真正做到明德亲民。问者又提出“曷止之？”湛若水因此点出“格物”之法，“格物也者，即止至善也”<sup>①</sup>。西樵治学期间，他所强调的治学之法对其日后哲学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湛若水的《中庸测序》同样强调了核心的哲学议题。他极为担心无人可以真正理解子思的中庸之道，<sup>②</sup>去古已远，“道”早已被淹埋，为了复兴“道”，湛氏在笔端展现了他的思索：子思亦深感孔子之微言大义已失，忧心异端兴起，“道”将晦暗不明。一旦如此，则易导致体用相歧，支离之弊端也因而愈加凸显。因此，湛若水序文中写道：“本于天者，性也。《中庸》者，本诸性而道具焉，本诸体而用具焉，本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慎独，养其中而已也。”<sup>③</sup>总而言之，湛若水撰写《中庸测》的目的就在于使几近晦暗的“道”重新得以阐明。

湛若水在西樵撰写的另一篇序言则是“正德己卯春三月望甘泉湛若水书于大科书院”的《遵道录序》。<sup>④</sup>正德十四年(1519)，《遵道录》编纂完成，共八卷，所辑皆为宋儒程颢之言论，附有湛若水简短评述。<sup>⑤</sup>湛若水十分看重此书，因为他认为程颢的学说可以纠正自南宋以来就异常激烈的朱陆之争的弊端。实际上，在湛若水的时代，儒学大师及其门人弟子总会因为这一争论的立场而被贴上相应的标签，尤其是认为陆学具有相对优势的学者。以任何方式鼓吹陆学都有可能被认定为诋毁朱熹，或者说挑战既定的科举课程和官方权威。支持陆学就是与传统官学相悖，因而这是一个需要学者捍卫的立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湛若水最主要的担忧不在于如何支持这些不遵循官学传统的学者，而在于希望他们对这种在他看来已经完全被误导的学术狂热有所警觉。他告诉崔铣，在西樵山时就意识到很多学者都标榜自己是陆学学者。尽管湛氏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陆象山所主张的“灼见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六《古大学测序》，第19页。

②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六《中庸测序》，第19—20页。

③ 同上。

④ 湛若水：《遵道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页。

⑤ 湛若水：《遵道录》，第1—58页。



道体”是一个学者极难达到的高度，因此他又不得不担心盲目遵从或许容易导致入禅。<sup>①</sup>这是湛若水极力反对的，他一直很明确地划分儒释之间的界限。他对陈惟浚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认为陆象山“主内太过”，忽视了个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职责。同时，陆学也确实不如程颢的“内外合一”之道，他因而告诉陈氏：“近编得《遵道录》，盖欲人求之中道也”<sup>②</sup>。程颢的思想可以将学者引至“中道”，也就是做到心内与心外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此，这篇序文总结了全书的主旨，即如何达到“合一”的境界。<sup>③</sup>

湛若水也整理注解了其他三部经书以及陈献章的诗集，其中一部就是《小学》。他曾对大书院学生强调过此书的地位，《大学》是成年人的修身之法，而《小学》就是幼童和少年的入门指导。<sup>④</sup>然而不幸的是，最初完整版《小学》已不可得，只能从《礼记》中发现零散的篇章。此外，朱熹整理的版本并不完美，因为他任意添加了一些后世的文本。这些文本既不隶属于原书，也不适合幼童，而是更适合于成年人。于是，湛若水的目标便是搜集整理《礼记》中的《小学》原篇，并且单独编纂。大书院其中一条训规便是：“诸生中各有带亲戚、宗族、子弟随学，可令读古《小学》，习《小学》之事，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及六艺之文。”<sup>⑤</sup>

作为陈献章思想的主要诠释者和传播者，湛若水在西樵山的时候，就在寻求进一步巩固江门学术的方法。正德十二年（1517）夏，他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这部两卷本的诗评收录了陈献章167首古诗。在初版序言中，湛若水认为陈白沙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教学著作，但是他的诗集却足以体现其教学特色。同时，湛氏也加深了白沙诗论教学法的宇宙性意义：

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天下后世得之，因是以传是为教。是故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〇《寄崔后渠司成》，第23页。

②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寄陈惟浚》，第4页。

③ 关于程颢对湛若水学说的影响，参见钟彩钧《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第354—358页。

④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四，第138—139页。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五《大科书堂训》，第6页。



风雨雷霆皆天之至教也，诗书六艺皆圣人之至教也。天之至教运，而万物生矣。圣人之至教行，而万化成矣。<sup>①</sup>

湛若水由此而将白沙置于圣人的行列，正如黎业明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湛若水给每首诗都做了详细的注解，这对于理解湛若水如何诠释和传播白沙学说尤为重要。<sup>②</sup>这也是他的治学目标之一。湛若水在出发去北京复职之前，将陈献章墓迁至皂帽峰下，并撰写墓志铭。<sup>③</sup>此后，他主建的每一所书院都会祭祀陈白沙，设立一间祠堂，悬挂白沙画像。

湛若水住在烟霞洞时，专注于书院教学、著书、与学友同僚通信和论学等学术活动。众所周知，通常明代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这类学术活动的记录文集，一般由其学派的一代或者二代弟子编纂完成。在这类文献中最珍贵的莫过于语录了，但这种文献体裁又是宋代理学家的特色。<sup>④</sup>幸运的是，湛若水的学生也为他编纂了三部语录：《樵语》《新论》和《知新后语》。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的学生沈珠在给《樵语》作序时，强调了此书的重要性。序言中，他提及了其师主教南京国子监（湛若水那一年刚被任命）时的政绩，“嘉靖甲申冬，我师甘泉先生既主南雍教事，习振颓，率德约礼，一月而大纲陈，三月而众务举”<sup>⑤</sup>。沈氏进一步指出，为了更好地安顿远方求学士子，湛若水“于是开讲院以授及门之徒，辟观光馆以处四方来学之士”，同时，也用《大科训规》《知新明论》《二礼训测》和《樵语》教导学子。沈氏还特别突出了《樵语》的重要意义，“盖先生教人，循循善诱，而樵语者，实先生设教西樵时，门人所录也。先生之学，启乎江门，契乎濂洛，而上泝乎洙泗，纯粹中正，备见诸所著，是编则其精要尔。诸生因相与刊之，以广先生之教云”<sup>⑥</sup>。因此，为了弘扬师说，湛门弟子合力搜集整理湛若水的讲学语录，并付梓刊行。《新论》和《知新

① 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② 黎业明：《湛若水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第46页。

③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五九，第3页。

④ 陈立胜：《理学家与语录体》，《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一《樵语》，第1页。

⑥ 同上。



后语》的编纂情况也与此类似。

书院常有如此的哲学辩论，而为了在院内营造一种语录中的论学环境，湛若水亲自制定了67条规章制度，即《大科书院训规》。<sup>①</sup>大科书院的训规完成于正德十五年（1520），湛氏在前言中揭示了撰述缘由：“五十以忧病归西樵。樵中有烟霞之洞，四方英才集焉，乃胥与集石为台，因台集木，为居、为堂、为馆、为讲学进修之地，以迓大科峰，因曰‘大科书院’，诸生咸请有教言。”<sup>②</sup>

湛若水起先并不愿意传授治学方法，他的学生只得空等一年之后再次请求。即便如此，还是在耗费了一段时日之后，湛氏才勉强答应。虽然他仍旧不情愿，但又担心不如此应允会引发更多问题。因此，他将这些训规逐条排列，并且写道：“凡以发诸心性也，凡以归诸心性也，凡以无所外于心性也，吾其不徒言也已。诸生以吾不徒言之实，而求得吾之所以言焉。由得吾之所以言，而契夫吾之无所容于言焉，其几矣！其几矣！”<sup>③</sup>

此外，湛若水著有一篇《心性图说》，短小精悍，却又意蕴深长，是其心学宗旨的精要概论。嘉靖三十一年（1552），门人郭肇乾作《心性书序》，写道：“乾自己卯岁西樵山从侍烟霞洞天，得受此图。”<sup>④</sup>这给勘定《心性图说》的写作时间提供了线索，即不会晚于正德十四年（1519）。郭氏同时认为，湛若水撰述此文主要是出于对学子的担忧。他们不明心性之学，更加不懂心性之道，“大道晦而异端兴，学术乖而真儒鲜”<sup>⑤</sup>。当前一部分学者的问题就在于过度滞于内心观感，忽视外部世界的联系。反之，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又陷于外部事务的繁杂而忽略内心的修养。因而，坚持内外合一、心事合一，遵循圣贤“一以贯之”中道的学者，极为少见。由此可知，《心性图说》就是为了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也是为了“示人心性之本体”，让学子们明晓为学之要是“欲正人心，放淫辞，归于中道而已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五《大科书院训规》，第5—17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③ 同上。

④ 郭肇乾：《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三一《心性书序》，台北“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2005年版，第6页。

⑤ 同上。



耳”。序言中，郭氏又提出疑问：“欲正人心，不先明心性，何能至归于中道也哉？”最后，他认为“翁不得已而作图书，示人心性之本体也。是性也，即天理也，识得天理随处流行充塞，无方无体，程子所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此物也”<sup>①</sup>。

金安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将《心性图说》译成英文，<sup>②</sup> 简要概述了湛若水心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并勾勒出其心性诠释的哲学维度。文中，湛氏开篇便重申了程颢关于天地万物一体的论断，并且“浑然宇宙，其气同也”。性是“心之生理”，因而心性合一，也即认知的充实与生存的动态密不可分。心体万物而不遗，无支离，与宇宙浑然同体。因此，在湛氏所绘的《心性图》中，心和性都置于同一个小圈中，而囊括空间和时间的整个宇宙则在一个稍大的包含小圈的大圈中。实际上，中间包含了剩余的其他部分，也即我们的心包含贯通了万事万物，“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sup>③</sup>。最重要的是，湛若水简要强调了心或者宇宙，都没有任何隔阂间隙，真实是没有分歧、不分内外的。他在此处详细阐述了一套“一元论”的哲学体系，超越了二元认知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尽管这是道学学者的论述话语。

至此，对湛若水西樵山重要著述的考察已然完成。通过将这些文献内容与湛氏同一时期丰富的信札进行比较，可以勾绘出其教学方法的基本轮廓。因此，笔者将依次论述湛若水对其弟子和学友所面临主要问题的思索，以及他为这些人提出的为学目标和具体实践方法，从而完成对这一问题的考察。

鉴于《大科书堂训》篇幅过长，湛若水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则纪要，并附上包含主要观点的图表，作为序言。序言的前半部分界定了积极向上、有建设性的行为和态度，有益于学子个人的德性修养和学术成长。后半部分则是消极无益的行为，导致学子陷入小人之道的泥潭。大体上，学子若是踏入歧途，则会好利，“利为无志，为肆欲，为虚乐，为外伦求道，

① 郭肇乾：《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三一《心性书序》，第6页。

② Woo, “Chan Kan-ch’uan”, pp. 39-42.

③ 湛若水：《心性图说》，转引自王文娟《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第101—103页。



为先文艺，为巧令以滋伪，为暴怒，为事父兄也不诚，为不求师，为传而不习，为抗倨，为同门猜嫌，为期约不信，为师成心，为徒事举业以干禄，为支离，为读书主敬两途，为作字欲好，为粗心，为桎亡，为泛滥仙佛以坏心术，为欲胜人，为纵放家童”<sup>①</sup>。

《大科训规》的主体部分则详细论述了更多湛若水所关注的有关修养品行的具体问题，他给年轻学子拟定了一系列品行不端的行为，并且定下相应的惩处条例。他尤为担心以自我为中心、粗鄙无礼、量小善妒、交相党与、不履行个人职责、欺压弱小和爱出风头等行为。<sup>②</sup> 湛氏不主张学生对他人抱有过分期待，或者自以为是傲慢无礼，轻视、辱骂他人。<sup>③</sup> 学子们都“去圣贤甚远”，湛若水因而指出他们初学时的迷茫无措，“初学用功，茫然无着力处”<sup>④</sup>。尽管无人真正经历了“关门静坐”时的洞悉真理，但是很多学子都认为自己通晓古今。<sup>⑤</sup>

这些问题的解决之法——就修养品行和端正态度而言——也都包含在训规之中，下文将着重讨论。湛若水对于异端大行，亦是深感忧虑。因此，他所列举的一系列恶行也体现了他对学子深陷二元论的泥潭或是沉迷于佛老的担忧。正德十六年（1521）秋，湛若水为广东四会县县学撰写记文，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正如游腾达所指出的那样，湛氏西樵教学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合一之学”。<sup>⑥</sup> 如此看来，湛若水似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发现一种被误导的、不完整的思维模式，他称为“支离”，这也是湛若水时代学者们用来批评某个学派、思维方式或者教育方法的常用术语。在这些语境下，可以将其理解为“有缺陷的”“不连贯的”，抑或是“相分离的”。这个术语也常被心学学者用来批评朱学学者的本本主义和默墨守成规，他们认为朱子学无助于学者的德性修养，也无助于加深对心、性、天理等基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五《大科书院训规》，第2—3页。

②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书院训规》，第199—200页。

③ 同上书，第195页。

④ 同上书，第194—195页。

⑤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68—69页。

⑥ 游腾达：《湛甘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60—61页。



然而，对于湛若水来说，“支离”就在于“二元”或者“一分为二”，也可视之为“散乱”。对此，《重修四会县儒学记》的论述十分充分。湛若水认为治学修道需要遵循“一贯之法”，古人通晓此理并以之施教。治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道，因此“圣人修道以成天之能，君子修身以复己之命”。但是，当今学子却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都折射出一种支离的学风。由于文官和武将的分离，国家缺少全能型人才。同样，才与德、体与用、知与行、动与静、举业与德业，皆是如此。<sup>①</sup>然而，对于湛若水来说，这并不是事物原本的模样，其导致的后果也必定十分严重。故而，他在文中写道：“故自支离之说兴，而儒学坏矣。儒学坏而天理几乎息矣”<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异端便露出端倪，在孟子时代是杨朱和墨子，在二程时代是佛老之学。因此，学子应该“原本及末，故知‘合一之说’，则可以化举业而知道矣”<sup>③</sup>。

欲深入认识湛若水所面对的这类理论性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他为学子所设立的治学修道目标。尽管湛氏的治学目标看起来深奥难懂，但是学子们只有在明晓自己追求的目标之后，才能知道是否误入歧途。湛若水认为，《易经》中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体现了其治学目标的其中一个面向。<sup>④</sup>另一个则是扩充本心，“大其心，然后能全体天地之性”<sup>⑤</sup>。在第一种情况下，湛氏将心看作本源，属于本体论的层面；第二种情况，他谈及的却是一种彻悟。二者并非互不相干，心之广大深奥正是孟子所说“尽心知性知天”。当他的学生杨鸾（字少默）问他本心和宇宙的区别时，他说二者合一，如同火光和所照之物的合一。因此，“不知本心者，不足以语天地万物同体之理；不知天地万物同体者，不足以语本心之全”<sup>⑥</sup>。

湛若水制定了区别支离与合一的基本方法，最有效的就是“觉”，<sup>⑦</sup>也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二六《重修四会县儒学记》，第20—2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答余督学》，第11页。

⑤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64页。

⑥ 同上书，第79页。

⑦ 同上书，第74页。



即做得“心体万物而不遗”的程度。<sup>①</sup> 他也告诉杨鸾，“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sup>②</sup>。此处，湛若水只是简单地提出一种不受任何客体限制的认知方式，就像镜子能够反射出所有经过的物体一样。面对王阳明认为其思想偏向二元论的质疑，湛若水反驳道：“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sup>③</sup> 他将这种以心为本的状态描述成“中”，即“何往非中矣”<sup>④</sup>。

湛若水将以“中”为基点的生活道德准则界定为“正心”，此心之知觉严于自律，也需要谨慎反思和心存敬畏。<sup>⑤</sup> 这是公正仁善之心，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础，同时也是参透精义、进入虚灵和通晓天道的必备品。<sup>⑥</sup> 湛若水曾对郑洛书（1517年进士）说：“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发于人伦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则道矣。”<sup>⑦</sup> 湛氏认为，心就像一个纯粹的虚空，性生于其间，触物而发，“性触物而发，故谓之情。发而中正，故谓之真情，否则伪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sup>⑧</sup>。因此，如果这些情发出于中正处，就是道，即随天理而生的真情；但若是发自别处，脱离中正，则会心性皆失，道亦如是。前者是构建社会秩序，实现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湛若水再一次使用了镜子的类比，“今之小其心者，如掩鉴焉，一隙之明，照者几希矣”<sup>⑨</sup>。但是，大多数人的心都被物欲遮蔽，陷入扭曲失真的困境。“善学者如悬鉴焉，明其体矣，物至而照焉，不迁以就之，如迁就焉，本体亡矣”<sup>⑩</sup>。换言之，学业有成之人才能还原心之本体。湛若水将这类心描述成广袤伟岸之心，完全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习心”。就像一块不纯的金属，这颗心必须要经过锻造才能成为“道心”，“习尽则元来

①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11、72—73页。

②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答杨少默》，第8页。

③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先次与阳明鸿胪》，第1页。

④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72页。

⑤ 同上书，第74页。

⑥ 同上。

⑦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复郑启范进士》，第31页。

⑧ 同上。

⑨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64页。

⑩ 同上。



本体广大高明，何尝有缺？何尝沾惹？内外合一”<sup>①</sup>。因此，原本纯粹高明的本体便可完美呈现，借以达到内外合一的境界。

最后，湛若水在西樵山也时常提及“一以贯之”，<sup>②</sup> 他为杨鸾所作的序文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对此，前文已有论述。杨鸾在西樵山从学于湛若水，一年以后准备返回潮州家乡，湛氏在其临行前交代道：“一尔心，勿支离尔学矣！”<sup>③</sup> 湛若水再一次强调支离就是二元论，或偏于外，或偏于内。然而，现代学者多将前者看作支离，却认识不到后者亦有同样的问题。过于偏重外部世界意味着忘记本原而被生活所束缚，过于强调内心就会导致一种虚无，以及对客观事物的厌恶。两种极端都是病态、分离、不完整的。内外必须合而为一。湛若水将其心学思想置于程颢的学说体系中，认为学子在德性修养的过程中要通晓“君子之学，内外合一，动静合几，体用合原，物我合体”的道理。<sup>④</sup>

湛若水认为合一之学根源于远古圣人的思想和生活，尧曰“持中”，舜、禹曰“精一”。禹传至汤，汤又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曰“一贯”。孔子传至颜回，曰“博约”。这种“一贯”是内与外、动与静、物与我、体与用的合一。湛氏进而指出，孔、颜之后，二元论便开始兴起，原本的一体被分裂，直到宋代程颢重新提出“一原”和“无间”，但是此后支离之弊再次出现。因此，湛若水对杨鸾道：“内外分而动静判，动静判而体用离，体用离而物我间。夫天之生物，一本也。夫道，一本者也，知不二本。又何有于内外？故一之而后可以入道，道无二也。”<sup>⑤</sup> 这种一原，或认知的统一，在湛氏看来，就是古圣人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以贯之”之学。

湛若水在西樵为学子制定为学纲要和求学目标时，提到了治学修道时遇到的异端思想，他在与同僚论学的信件中也谈及此类话题。此外，在《大科训规》序言中，湛氏概述了学子在求道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

①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第194页。

② 参见游腾达《湛甘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2年。

③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七《送杨少默序》，第78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范和学习态度。<sup>①</sup>对于这一系列德性修养的方法，他认为：“义为志道，为体认天理，为寻乐也实，为求道于人伦之间，为笃实，为言动由中出，为不怨尤迁怒，为事父兄也诚切，为自得师，为传习，为遇长者谦让，为处同门久敬，为约信，为去成心，为二业并，为内外混合，为读书调心合一，为作字也敬，为考业用心也精，为观山水不失己，为博六经以开知见，为作文也发挥所得，为教束家仆”<sup>②</sup>。

上文所概述的为学之法聚焦了《大科训规》的主要论点，多数与学子端正态度、调理性情、增长学业和个人修养有关，以至于君子人格的形成，进而参透心性之精微义理，体认天理。为学关键在于立志，“志于道”便要时刻保持一种严谨的态度。因此，湛若水规定：“诸生为学，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固其基址乃可。”<sup>③</sup>学子们应该勤于求教、恭敬雅致、保持谦逊、恪守礼教。

勤于自律和恪守日程都是湛若水治学法的重要内容，《大科训规》就规定“诸生进德修业，须分定程限，日以为常”<sup>④</sup>。他要求学子每日鸡鸣时分起床，即早上3点钟，大声诵读经书到9点；随后，静默阅读四个小时，直到下午1点；其后，则是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直到下午3点；再静坐冥思至晚上7点；晚上则温习功课，直到11点。经过一段时日，学子们便可日渐坚定个人学识和德性修养的提升。日积月累之后，便会“月异而岁不同矣”<sup>⑤</sup>。至于行为举止的规范，则要求始终坚持内外合一。

湛若水治学法的另一项内容，就是将认真履行训规中各项符合个人社会定位、秉承人际交往规范的条款，作为学子学业进展的考察条件。也就是说，对其学生而言，必须做到恰如其分的顺从和循规蹈矩，以及在处理个人关系中恪守礼仪。此类人际关系则包括与父母、长者、幼童、友人、

<sup>①</sup> 参见肖啸《明代书院与心学践履——湛若水〈大科训规〉所见为学旨趣析论》，《西樵理学家山500年暨中国古代书院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7年，第481—495页。

<sup>②</sup>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第188—189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93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94页。

<sup>⑤</sup> 同上。



同门、宗亲、乡党和家仆的交往。不言而喻，湛若水对道德规范的要求十分苛刻。学子应该定期回乡省亲，侍奉父母兄长，以示孝敬，“若见父兄愉悦，便是己学进处，不然未见实力”<sup>①</sup>。为了弥补山中读书不能尽孝的遗憾，学子们便需要加倍努力，勤于学业。<sup>②</sup> 学子们应该选择一位以德行著称的老师，听从教导，“以自养其恭敬之心”<sup>③</sup>。至于同门之间的交往，湛若水写道：“诸生同门相处，有兄弟之义，要使相爱如兄弟乃可，即此是道。”<sup>④</sup> 因此，他们必须要养成恭敬之心，彼此之间真诚交谈，以此面对生活、学业上的困扰，以及观点异同这些问题。最后，对于带小厮家仆来书院的学子，则“须要恩顾之。饮食，寝卧衣服亦须照点，切戒暴怒，即以此做工夫”<sup>⑤</sup>。

湛若水的治学之法颇多，此处不再赘述。然而，他更进一步的治学目标则在于希望达到《大学》中的“明德亲民”。他在写给陈海涯的信中也是如此回复，并提出仅仅是静坐如何明德，“自少而长，岂有不应事者”？<sup>⑥</sup> 一旦睁开眼睛，便须“应事”。湛若水也以此教导其他学子，个人修养的一贯之法也蕴含在《大学》文本中。这并非是某种理念上的支离之法，将明德和亲民分为两段，导致学子循环往复做两段工夫。而是遵循合一之法，在本末一气、物我一体的基础上，将两者合而为一，“若不亲民，则已性分有缺”<sup>⑦</sup>。

因此，湛若水始终不强调静坐，即便他希望学生修习此法。他在信函中告诉余督学，古人从不说静坐，二程提及，也仅仅将之作为学者在面临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补充措施。<sup>⑧</sup> 实际上，他认为强调静坐的学者都已入禅。再者，孔门学子却在具体事务中求仁，且“动时着力”，静坐冥思时显然不能“着力”。心上着力必须要面对生活，以心为基点，指导日

①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③ 同上书，第198页。

④ 同上书，第199—200页。

⑤ 同上书，第196页。

⑥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九《答陈海涯》，第5页。

⑦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三《知心后语》，第3页。

⑧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答余督学》，第11页。



常具体事务。这种“着力”就是“执事敬”。一味求静容易陷入荒忽寂灭之中，而持敬则可“复见天地之心”，洞悉天理，进入尧、舜之道。因此，善学者以“敬”为准则，坚持动静合一，力求做到非二元与内外合一。但是，湛若水也指出，这个法门“言之易，行之难，非一朝一夕之故也”<sup>①</sup>。

实际上，湛若水在西樵山的时候，无论是与同僚通信，还是给弟子、学友为学建议，都始终提倡正念冥想。这是一种静观之法，也是最重要的治学之法。通常，这就是“敬”。当学生问他如何方能完全识得本心时，湛若水答道：“其敬乎！至敬无累，明鉴无蔽。”<sup>②</sup>对于湛若水来说，持敬便可识得如明镜一般的心之本体，通晓心之广大。<sup>③</sup>此外，他亦认为“格物”和“随处体认天理”是必不可少的治学之法。《大科训规》有曰：“诸生用功须随处体认天理，即大学所谓格物，程子所谓至其理。将意、心、身、家、国、天下通作一段工夫，无有远近彼此，终日终身，只是体认这‘天理’二字。”<sup>④</sup>

自从弘治十年（1497）湛若水在陈献章门下悟道以来，体认天理就成了他的治学目标。在入住西樵的两年多前，湛若水告诉王道（字纯甫），治学的关键在于察见天理，体认这日用常行间识得生生不息的天理，“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学者察识之耳”<sup>⑤</sup>。这就是学问涵养之所在，关键在于无论动静都须持敬。在西樵山时，湛若水反复与学生、友人讨论“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他对杨鸾道，除此以外，“更无别事”。体认天理就是格物，格物是认识心之本体的必要工夫，而此心则是体万物而不遗者。<sup>⑥</sup>

综上所述，湛若水在西樵隐居多年不仅仅是为了养病，同样也是为了逃离昏庸的帝王和不可预测的政治生态。他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很多著

①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答余督学》，第11页。

②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樵语》，第64页。

③ 同上书，第63—64页。

④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第193页。

⑤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八《寄王纯甫验封》，第2页。

⑥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9《答杨少默》，第7页。另外，湛若水这些年的中心议题是与阳明论“格物”，以及二人对心性的不同理解。王、湛的论辩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可参见Woo, Ann-ping Chin, “Chan Kan-ch'uan and the Continuing Neo-Confucian Discourse on Mind and Principle”, pp. 55 - 79.



作，突出了其为学之本，并将之作为一种教学法，付诸实践。湛若水通过评论《中庸》和《大学》、注解程颢语录和白沙诗作，呈现了其心学思想。为了教导学子，他建立了第一个书院并且亲订训规，同时允许学生整理编纂讲学语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将儒家的思想和教法具体化，并与王阳明相抗衡。他的心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不仅指导学子们通过书院的修身求道以补救场屋之学的弊端，同时还为此后三十年间的书院创建和著作编纂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美国中乔治大学；译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